

# 完整準確、不折不扣地貫徹落實香港國安法

## 議事論事 陳道理

維護國家安全是香港特區的憲制責任和必守底線，特區行政、立法、司法機關應當各司其職，依法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涉嫌「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香港有關法院批准由英國大律師代理黎智英案，被指違反香港國安法的立法精神和法理邏輯，引起各界高度關注。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表示將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釐清香港國安法的立法原意和目的，這是符合香港法治精神的必要之舉！

香港國安法的制定，具有特殊的背景。香港市民不會忘記修例風波期間香港一條條道路被堵塞，一座座地鐵站被破壞，一間間商舖被打砸，一個個燒瓶、汽油彈在街頭爆炸，以及普通市民被圍毆甚至淋油燒身的慘痛景象；不會忘記反中亂港頭目策動港版「顏色革命」的推手公然乞求

外國制裁中國、制裁香港甚至宣稱「為美國而戰」的罪惡行徑。反中亂港頭目及其團夥犯下的樁樁罪行，必須受到依法追究、得到徹底清算。

### 不應簡單套用一般原則

此次案件的主角黎智英，申請外國大狀來港辯護，案件擾攘多時。但自法院作出相關判決後，不少香港社會上的愛國愛港人士和法律界正義人士提出，作為香港的司法機構，理應具有高度的敏感，自覺負起維護國家安全之責。但令人遺憾的是，一些人無視各界的擔憂，簡單地套用審理一般案件的原則、程序和習慣，並以所謂「國際標準」來約束香港國安法的適用和執行。這足以反映，香港一些法律界人士未能正確認識香港國安法的憲制地位，這是對香港國安法權威性、凌駕性的無視，對國家安全和香港的繁榮穩定的罔顧，已對案件的依法公正審理和香港國安法的準確實施構成重大挑戰，對特區政府維護國家安全帶來重大風險。在律政司作出所有

努力都未能扭轉局面、案件性質超出特區政府處理能力的情况下，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就是必然的選擇，也是香港法治的內在邏輯。

在昨日的記者會上，李家超指出事件影響深遠，作為香港行政長官和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主席，他有憲制責任就黎智英案建議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釐清香港國安法的立法原意。他清晰闡述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的「八大理據」，包括一些西方國家對香港國安法持有敵視態度，曾推出制裁措施，又向商界、法律界施壓。鑒於目前香港沒有機制可以排除無在港執業資格的外籍律師受外國勢力影響的風險，也沒有辦法排除外籍律師的洩密風險，因此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不容許外籍律師參與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以

確保國安法第六十三條有關保密的規定。他同時強調，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不影響被告自由選擇在港有執業資格的代表律師的權利，釋法內容也不會套用於香港的外籍法官身上，因為法官經過嚴謹的制度程序委任，涉及香港國安法的案件有指定法官運作，兩者不能「混為一談」。

### 釋法是香港法治一部分

李家超特別指出，他前日收到中央政府按香港國安法第十一條的函件，就國安法實施以來特區履行相關職責向中央提交報告。港澳辦在聲明中指出，香港的政治體制是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在行政長官之下，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各司其職並共同擔負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和義務。李家超根據中央指令及時提交報告並提出有關建議，充分體現出作為香港特區「當家人」和「第一責任人」的擔當。中央全力支持其履行法定職責、行使法定職權，依法採取必要措施，防範化解各種威脅國家安全的風險隱患。

需要強調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基本法、香港國安法的最終解釋權，當香港司法機關對有關法律及立法原意產生誤解、曲解時，人大常委會有憲制責任作出解釋，而這種釋法本身就是香港法治的一部分。香港回歸二十五年來，人大常委會曾就基本法五次釋法，特區政府和香港終審法院都曾依法作出相關提請，而香港法治非但沒有受到任何損害，反而得到進一步加強和完善。香港法治的國際排名長期位居前列這一客觀現實，證明反中亂港勢力對人大常委會釋法的一貫抹黑和「妖魔化」，根本就站不住腳。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中央對香港特區有關的國家安全事務負有根本責任，必將深入落實中共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的「完善特別行政區司法制度和法律體系」的要求。唯有如此，才能確保香港國安法得到完整準確、不折不扣地貫徹落實，確保國家安全得到有效維護，這也是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和港人福祉的根本所繫。

## 越洋聘大狀 黎智英的最後「剩餘價值」



### 焦點評論 吳志斌

香港各界近日就高等法院批准黎智英聘請英國大律師為其辯護而提出質疑，律政司亦提出上訴。11月9日，上訴庭駁回上訴申請；21日律政司向上訴庭申請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被拒後，22日，律政司直接向終院提出上訴許可申請，該案件上周四開庭。由終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常任法官李義和霍兆剛處理。案件昨日頒下書面判詞，終院拒絕律政司的上訴申請。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會向中央政府建議，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香港國安法第六十五條作出釋法。

被告聘請外籍律師替其進行辯護在香港並不稀奇，但「黎智英案」為何引發如此激烈的反對聲音？這根本涉及到的如何捍衛香港法律的尊嚴、底線和原則的問題。

首先，黎智英何許人也？作為反中亂港頭目，黎智英的背後牽扯是一個龐大的海外反華網絡和黑暴資金的運輸管道，前一陣子竄台的佩洛西也曾是其「座上客」。作為涉嫌勾結外部勢力的國安犯罪重犯，黎智英涉嫌干犯的罪行是香港國安法下的「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而他「捨近求遠」聘請的洋律師，還不僅明顯存在着利益和角色衝突，還暴露其痴心妄想，即指望外部勢力來「救場」。

香港國安法其中一個立法目的，就是要防止反中亂港分子與外部勢力內外勾結，若是任憑黎智英「調兵遣將」，讓洋律師「唱大戲」，恐怕是與國安法的立法原意背道而馳。故此，在聘請洋律師為黎智英辯護方面，首先是常理方面的「不能」。

其次，聘請洋律師來辯護國安

案件，這根本不符合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之要義。維護國家安全是香港特區的憲制責任，為特區重中之重之任務，香港正處在從亂到治進入由治及興的關鍵時期，如今的社會和諧穩定局面來之不易，國安之工作，輕視不得。

聘請洋律師參與國安案件，在現實層面操作有極大的風險。第一，香港國安法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全國性法律，屬大陸法系，以中文寫成，以中文為準，外國律師既不熟悉中文，更不熟悉內地法制（英國屬於海洋法系），不僅對審訊裨益不大，甚至可能會有偏頗和理解的誤差。

第二，無論是香港法律界還是司法機構，都對Tim Owen的底細不清楚，這極有可能造成另一種國安的威脅。正如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執業大律師馬恩國指出，「縱容黎智英聘請英國御狀或有可能導致國家機密洩露，此非終審法院所能彌補。」

第三，全世界關於國家安全的案件審理來看，鮮有自己國家的國安案件讓另一國家的辯護律師參與其中。故此，此舉還存在法理方面上的「不行」。

第四，黎智英的勾結外部勢力的罪罄竹難書，其案件具備移交內地受審的條件。根據香港國安法第五十五條列明「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經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或者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提出，並報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由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對本法規定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行使管轄權：（一）案件涉及外國或者境外勢力介入的複雜情況，香港特別行政區管轄確有困難的；（二）出現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無法有效執行本法的嚴重情況的；（三）出現國家安全面臨重大現實威脅的情況的。」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譚耀宗也明確表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

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決不能容許非香港執業的外國大律師為涉及勾結外國、境外勢力等案件辯護。」這樣看來，容許黎智英聘請洋律師辯護，在情在理在法都是「不妥」。

香港審判反中亂港分子，本來就是「打掃乾淨屋子」的「自家事」，香港法律基礎雄厚，人才濟濟，能為之做辯護的律師也是大有人在，何必捨近求遠地重金聘請外國大狀？有不少外媒借「黎智英聘請洋律師」一事大做文章，聲稱事件會成為香港法治和普通法系統的「試金石」，更是窺視香港司法獨立與否的重要窗口，若最終拒絕黎智英的外國律師聘請，即可判斷香港的司法體系已經崩潰，淪為了中央政府的附庸，云云。

然而，香港的司法獨立是毋庸置疑的，法治環境亦是成熟且有序。雖然司法獨立和法治環境有序會被別有用心之人拿來打「香港牌」，但事實上香港的法治環境沒有變化也不會變化。

「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黎智英想借助外國大狀來「翻身」，進而與西方勢力做到「暗渡陳倉」，可惜也不過是獻祭了自己最後一點「剩餘價值」，為外部反華勢力甘作「刀俎魚肉」。

雖然終審法院拒絕了律政司的上訴申請，但不代表黎智英能借用洋律師替其翻身，因為打掃自己屋子的垃圾，還是得靠自己動手。

李家超昨日表示，將在向中央政府提交的香港特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職責報告中，建議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香港國安法第六十五條作出解釋，根據國安法的立法原意和目的，釐清沒有本地全面執業資格的律師或大律師，可否以任何形式，參與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工作。這一決定受到各界的堅定支持。

中國僑聯委員、安徽省政協委員、香港安徽聯誼總會常務副會長

## 精準有效防控 確保安全復常



### 港事港心 陳正寧

香港疫情近日明顯升溫，每日新增確診人數回升至約8000人；更值得留意的是，住院患者數目也隨之上升。卡塔爾世界盃已經揭幕，市民盡情欣賞國際足球盛事的同時，亦須做好防疫工作，若疫情大幅反彈，將影響香港的穩健復常，特區政府及社會各界都不可掉以輕心。筆者認為，當前必須採取精準有效的防控措施，做好以下幾點，確保香港安全復常。

首先，要繼續提高疫苗接種率，構建社區防疫屏障。醫務衛生局表示，香港已接種第一劑新冠疫苗的市民超過94%，但「一老一幼」的接種率仍然不理想，呼籲尚未接種的市民，特別是長者、長期病患者、兒童及其他免疫力較弱人士，必須盡快接種。

新冠疫苗可有效降低重症率和死亡率，這是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科學數據和醫學專家所證實的事實。香港之所以在放寬防疫政策後還能將疫情控制在可控範圍內，不會引致醫療系統崩潰，都是因為群眾的疫苗接種率已達到一個可觀水平。

資料顯示，本月初新冠確診者的住院個案一度降至1800人以下，方醫院有條件處於備用狀態。但隨著確診個案增加，短短三個星期時間，不論確診宗數，抑或住院人數，均較月初增加約五成。目前長者仍為最高風險一類，80歲以上者佔了整體住院人數約四成半，60歲以上更佔了八成。然而，住院增幅最大的卻是3歲以下幼童，三星期內暴增約一倍之多，比較長者約兩三成增幅，充分反映今輪疫情對幼童的威脅。目前3歲以下幼童已可打針，可惜最新一針接種率仍低至20%，可見情況堪憂。

特區政府早前宣布推展新一輪「上門鼓勵長者接種新冠疫苗計劃」，將上門為長者打針推展至七個地區的公共屋邨。抗疫不計頭路者，已成社會普遍共識，在此基礎上，唯有繼續呼籲市民踴躍打針，香

港復常才可更安全更穩妥。

其次，加強防疫監管也是重中之重。早前七名私家醫生因涉嫌濫發醫學豁免證明書（俗稱「免針紙」）被警方拘捕，他們共發出二萬多張，佔所有仍然有效的醫學豁免證明書超過一半。香港醫生的專業水平和操守一直享有良好的聲望。濫發「免針紙」斂財，令香港醫護專業形象蒙污。醫委會作為監察醫生專業水平和專業操守的行業組織，必須負起監督管理的責任，嚴肅跟進、介入事件，令市民能重拾對香港醫生的信任。

另外，除了醫委會做好醫生的操守監管，衛生署應設立主動巡查機制之外，還可以設立熱線電話供市民舉報，政府也可以詳細檢視受舉報醫生所批出的「免針紙」的真實性。多管齊下，讓全社會一起監督「免針紙」，讓「免針紙」早日恢復它本來的用途。

最後，就是不要再糾纏於「零加幾」，必須採取靈活措施，精準防控。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在可管控疫情風險的情況下，政府會盡量把限制措施減少，這個方向很清晰，不必拘泥於「零加幾」。特區政府放寬入境檢疫措施實施近一個月，成效立竿見影。按照現時的安排，入境人士接受三天家居醫學監測期間，仍可以上班、上學、出席商務活動，也可以去商場或超市，只是不能去食肆或酒吧等處所，影響已相當輕微。而且，近日內地多個省市正出現疫情多點爆發，廣東省更出現大量的確診個案，內地的防疫壓力不斷加大。如果香港一下子全面放寬檢疫措施，難免會影響內地抗疫工作。

香港接連成功舉辦多項國際盛事，社會經濟進入復常軌道，現在更需要保住成果，然後逐步優化，為旅客提供更大便利，為經濟注入更大動力。特區政府是維護市民健康的第一責任人，抗疫策略上應更加科學精準，也要更加靈活彈性，既確保防疫抗疫能力，也讓社會能夠盡快安全復常。

醫生、香江聚醫衛生專業人才委員會主任

## 德總理頻訪亞洲的真正原因



### 國際觀察 宋魯鄒

11月表現最受關注的世界領導人除了中美兩國元首外，還有德國總理朔爾茨。他上任還不到一年，三度到訪亞洲，全球也立即感覺到德國外交的變化。特別是他11月份在極短的時間內訪問中國、赴印尼參加G20峰會並在此之際訪問越南和新加坡。要知道中國是G20成員國，新加坡一直是G20的與會國，但他仍然選擇單獨訪問。這對於西方一個很有分量的大國，確實非常罕見。

面對世界的關注，11月21日朔爾茨在《南德意志報》主辦的經濟論壇上表示，世界正在日益多極化並發生根本性的結構重組，歐洲和北美國家能夠享受世界上最好經濟——「穩定的增長、低通脹和高就業率」的美好時光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相反，亞洲國家專注發展，依託區域經濟組織，正在穩健發展。

能讓一個日理萬機的大國領導人頻頻造訪同一區域，當然是國家利益需要。以中國為例，德國運動品牌阿迪達斯（adidas）中國業務佔比為21.6%，化工

企業Covestro的佔比為22.3%，而大眾汽車的中國業務佔比更高達40%。寶馬2021年在中國的銷售佔全球總量的三分之一。中國市場對寶馬的重要程度是美國的兩倍以及法國的十倍。

再看西方眼裏一向是落後國家的越南。德國是越南在歐盟國家中最大的貿易夥伴，其與越南的貿易額甚至高於荷蘭。所以今天德國外交的改變顯示的是世界大趨勢：西方要想繼續發展和繁榮已經離不開亞洲。

### 西方失去全球政經支配地位

眾所周知，西方過去數十年來經歷了大規模的去工業化，亞洲和西方形成了生產與消費的關係。但德國非常不同的是，它沒有搞去工業化，製造業仍然發達，而且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高達24%。所以德國外交變化的意義在於亞洲不僅是世界工廠，還正在成為世界最重要的消費市場。亞洲對西方和世界的意義和作用正在發生質的變化。德國只不過是春江水暖，也不會是唯一一個。

亞洲經濟在全球的比重一直在高速增长，2020年，亞洲經濟世界佔比首次超過50%。隨後的新冠疫情更凸顯了西方對亞洲的高度依賴。經濟是一個國家、一個地

區所有實力的基礎，它決定着政治、軍事、科技、體育甚至軟實力。2019年，中國全球專利申請第一次超過美國，這也是美國第一次失去這個位置。2021年中國有效專利數量又首度超越美國。2010年中國才有第一家企業贊助世界盃足球賽。到今年中國企業已超越美國企業，成為卡塔爾世界盃最大贊助商。這都是以經濟實力為基礎的。

顯然，傳統上以發展中國家為主體的亞洲崛起預示着西方正失去對全球政治和經濟的支配地位。

這一次德國總理朔爾茨到印尼參加的G20會議本身也是這種趨勢的寫照。G20領導人會晤機制是在2008年美國的金融危機引發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和全球經濟危機的背景下建立起來的。也是歷史上第一次大量新興國家成為創始國和發達國家一起解決面臨的全球經濟問題。在此之前，西方七大工業國的年度會議就決定了全球經濟事務。但2008年的危機令西方意識到它們已經無力獨自解決了，必須聯手廣大的新興國家，這其中亞洲國家超過四分之一。十多年過去了，亞洲繼續高歌猛進，西方則弊病纏身，活力不再。

朔爾茨的外交改變還向世界發出了一

個積極的信號：展示了一個西方國家與迅速發展的亞洲的相處之道。

中國、越南、新加坡、印尼和德國有着不同的文明背景，政治制度和價值觀也有明顯差異。但雙方是以平等、尊重的方式交流和對話，頗有求同存異之感。雖然朔爾茨也談到了西方關注的所謂「人權問題」，但已經沒有過去常有的威脅、說教的口氣，算是由他改變了西方「三人行，我必為師」的風格，也是雙方不同的發展狀況所決定的。

當然朔爾茨只是先行者，西方的這種慣性的改變仍然需要時間。卡塔爾世界盃，一些西方國家又舊病復發，以至於國際足聯主席因凡蒂諾都看下去，以自己一家早年身為意大利人在瑞士受到的歧視為例，痛斥：西方人在開始給別人上道德課之前，我們應該為過去的3000年道歉。

### 東升西降是歷史趨勢

作為西方重要政治人物，朔爾茨當然知道歐美弊病何在，也知道無解，否則他也不會發出「美好時光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的感嘆了。如果有解決之道，怎麼可能會一去不復返了呢？他現在嘗試的是通過外部，即與迅速發展的亞洲密切合作和聯結

尋求脫困方法。在這種情況下，他已經喪失再為師的資格和底氣，作為一個還算務實的政治人物，他既要接受亞洲的崛起，更要以平等、尊重的方式與亞洲打交道。

或許有人認為德國總理的亞洲行有特殊的偶然因素，即俄烏衝突。認為德國失去俄羅斯穩定和廉價的能源之後，它的製造業難以維繫，而不得不轉向亞洲。客觀而言，俄烏衝突確實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但它只是一個導火索、助推器，根本的還是幾十年以來的東升西降趨勢。這場衝突不過是壓倒西方的最後一根稻草。而且從歷史上看，俄羅斯和歐洲的關係起伏，合作與對抗交織。2011年11月8日，俄歐領導人在德國共同慶祝北溪一號通營，當時俄歐一家親的照片傳遍世界。現在雙方則陷入對抗。以史為鑒，雙方恢復正常也是轉眼間的事。所謂藉俄烏衝突擺脫歐洲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只是個假議題。

所以對於德國來講，這場衝突只是一個偶發因素，也不會長期持續，但東升西降卻是歷史趨勢。因此，反思自我，尋求解困之道才促成了德國總理轉向亞洲的外交改變。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